

# 重庆工商史料选辑

第三辑

(内部发行)

中国民主建国会重庆市委员会 合編  
重庆市工商业联合会

## 目 录

- 回顧重庆生絲业** ..... 温少鹤 ( 1 )
- 宝元通百貨公司剖視**..... 陈霽涼 ( 20 )
- 聚兴誠銀行創办人杨文光的一生**  
.....王憲之 卢瀾康 成訪莘 李其猷 尹叔陶 ( 53 )
- 聚兴誠銀行創立初期組織股份两合公司  
的真相**..... 李其猷 卢瀾康 成訪莘 ( 70 )
- 只有六年寿命的重庆証券交易所**..... 卢瀾康 ( 88 )
- 記買办軍火商罗升之** ...馬紹周 鮮伯良 黄云階 ( 101 )
- 暴力摧残下的江合煤矿** ..... 唐台異 ( 113 )
- 英美烟草公司与重庆卷烟市场**..... 杜振华 ( 133 )
- 四川瑞华玻璃厂的創办与結束**..... 蔣相臣 ( 149 )
- 重庆首創机器制革的求新制革厂**  
..... 田三益 陈陞階 ( 165 )
- 伍舒芳膏葯店**..... 伍敬輿 伍儀訓 伍儀勤 ( 176 )

## 目 录

- 回顧重庆生絲业** ..... 温少鹤 ( 1 )
- 宝元通百貨公司剖視**..... 陈霽涼 ( 20 )
- 聚兴誠銀行創办人杨文光的一生**  
.....王憲之 卢瀾康 成訪莘 李其猷 尹叔陶 ( 53 )
- 聚兴誠銀行創立初期組織股份两合公司  
的真相**..... 李其猷 卢瀾康 成訪莘 ( 70 )
- 只有六年寿命的重庆証券交易所**..... 卢瀾康 ( 88 )
- 記買办軍火商罗升之** ...馬紹周 鮮伯良 黄云階 ( 101 )
- 暴力摧残下的江合煤矿** ..... 唐台異 ( 113 )
- 英美烟草公司与重庆卷烟市场**..... 杜振华 ( 133 )
- 四川瑞华玻璃厂的創办与結束**..... 蔣相臣 ( 149 )
- 重庆首創机器制革的求新制革厂**  
..... 田三益 陈陞階 ( 165 )
- 伍舒芳膏葯店**..... 伍敬輿 伍儀訓 伍儀勤 ( 176 )

# 回顧重慶生絲業

溫少鶴

過去，我與絲業有着較長時期的歷史關係。由於我的家族早歲即經營出口絲業，清朝末年、民國初年我的叔父、堂兄曾先後在重慶磁器口建有旭東（後改天福）、華康機器繅絲廠，這就為我由教育界轉入工商界打下了基礎。我對絲業的關係，除民國初年協助叔父友松成立“改良絲幫”外，於民國十三年（1924年）重慶絲業公會成立，我曾任總董；後來的同業公會我又歷次擔任負責人，至解放後1958年結束同業公會為止，親身經歷了絲業的興衰過程，它的演變是值得令人回顧的。

## 一、重慶生絲業的興起

### 川絲發展帶動了重慶絲業的繁榮

四川早有“蠶叢開國”之說，可以想見川省蠶桑事業歷史悠久。還在清朝年間，省內已有不少熱心人士對於養蠶、繅絲不斷加以倡導，並且效法江浙，改進技術操作，改良生產設備，品質得以逐步提高，川絲乃取得外銷地位，遠銷英、美、法、印度、緬甸等國，而進入國際市場。

川絲遍產四川各地，著名的產區有：川東的合川、銅梁、巴縣、璧山、鄰水、綦江、萬縣、榮陽、開江等縣；川南的富順、

宜宾、威远、筠連、庆符、乐山、峨嵋、青神、眉山、仁寿等县；川西的成都、广汉、新繁、德阳、罗江、綿阳、梓潼、江油等县；川北的昭化、广元、劍閣、通江、南江、巴中、閬中、蒼溪、南部、仪隴、营山、南充、西充、蓬安、遂宁、射洪、三台、盐亭等县。川省早年系以土法取絲，前清末年，各地开始建設絲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厂者日多，全川共設有鉄机纜絲厂二十余家，拥有絲車約近七千部；此外还有手搖絲車两万多台。絲业又与农、工、商三方面相关連，如种桑养蚕属于絲农，纜絲織綢属于絲工，运銷国内外属于絲商，直接間接賴以为生者約近千万人。民国十年到十九年間（1921—1930年），川絲外銷逐年增加，特別在1922年到1924年为川絲极盛时期，年产量恒在三万担上下，每年出口的約有一万二千担到一万五千担，占川省出口貿易第一位，重庆成为川絲外銷集中轉輸的主要市场，随着川絲的发展，带动了重庆絲业的繁荣。

重庆蚕桑事业，由清朝同治八年（1869年）川东道姚觀元倡导，向江浙购桑种蚕种，于重庆城西浮图关隙地种桑养蚕，并在关內立蚕神祠，盖沿封建旧习，以示郑重，但进展甚微。直至清朝光緒末季（以光緒最后三年計，約在1906年至1908年間），才有八省侨商設桑园于浮图关之鵝項岭，复由向外学习蚕桑返里的石青阳等与当地人士罗錦章等联合，相繼举办各种蚕桑社（如裕蜀蚕桑社、錦国蚕桑社等有十余处），繼又創設蚕桑传习所，这些措施，为重庆絲业的发軔。

重庆蒸汽机械纜絲厂以石青阳所办蜀眉絲厂为最早。青阳曾肄业重庆府中学堂，与我同学，其后赴日本，在大野县长町蚕桑学校学习蚕业，丙午（1906年）謁孙中山先生于东京，入同盟

会，丁未(1907年)回国返渝，除为同盟会进行宣传联络工作外，并在重庆南岸界石乡筹设蜀眉丝厂，成立于1908年，青阳由于奔走革命，以该厂为掩蔽之所，因而未能专力经营，罕有成效。继有合川人张明经在重庆磁器口设恒源丝厂，甫经设置，即被火焚，乃由我四叔父温友松全部接买，加以修整，改名旭东丝厂。并从宁波聘请机器师乐阿英夫妇来渝，由乐负责机器安装，其妻担任缫丝的技术训练工作。当时技术工人极为缺乏，丝厂所需要的又都是青年女工，而一般家庭大都不愿青年妇女在外“抛头露面”，故初先愿意来厂习艺者人数甚少，厂方通过乐妻与当地妇女们以“拜姊妹”等方式，多方串联，邀约进厂亲自传授，于是风气渐开，逐步推广。友松见开厂有利可图，遂于1910年继续重建新厂，扩大经营，由我五叔父温社泉担任厂长，而以前厂为旭东第二厂（此厂其后停办），此为继蜀眉丝厂后设置较早的厂。其后旭东增资，盐业匹纱业商黄锡滋占股最多，乃改名天福（黄氏经营的牌号均冠以天字），社泉仍任厂长，直至身故为止。磁器口即巴县龙隐镇，距城三十华里，水陆交通甚便，旭东而后，丝厂续有设立，户口骤增，市场日臻繁荣，成为重庆当时工业地区。

辛亥革命（1911年）后，重庆丝厂逐渐增加，尤其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后，川丝外销量大增，获利亦厚。当时重庆企业界既认为丝业有利可图，且系一种有关国计民生的新兴工业，因而设厂经营者日多。重庆当时号称大帮的如盐业、匹头棉纱业、银行、钱庄等富有资力者，乃至军政各界，几无不投资于丝业（银钱业以与丝业借贷往来获取利润为业务重点之一，每年四五月间蚕茧上市日期，称为丝茧月份，银钱业调拨资金亦以此

时为活跃)。兹仅就回忆所及，略述几厂情况于后：1912年熊克武投資設置重庆南岸簸箕石馱川絲厂，以童子鈞为經理，癸丑革命失敗，熊氏出走，胡景伊执掌川政，改厂名裕蜀，以李晴湘为經理，袁世凱帝制失敗，熊氏还軍重庆，馱川复原厂名，童子鈞复任經理。1916年紗商黃德宣在磁器口文昌宮开办同孚絲厂，由伊子黃勉旃負責經營。1917年紗商楊泰阶在千廝門开办生泰絲厂，后改同泰絲厂。1919年匹紗商楊懋堂出資（楊氏原在川北設有懋華、懋康两木机絲厂），由我的堂兄溫晞谷在磁器口建設華康絲厂并任厂长（華康后改名善順）。1919年匹紗商刘靜修与聚興誠銀行楊氏弟兄合資，在磁器口建設謙吉祥絲厂。1922年盐业、紗商陳麗生在重庆菜园壩开办麗華絲厂。周伯初（重庆中国銀行行长周宜甫之子）在江北香国寺开办淑和渝絲厂。此外还有大江、肇興等厂，設置情形未能尽忆。

与此同时，帝国主义者也垂涎重庆絲业，而插手經營。清朝末年，有日商新利洋行大班宮板和这家洋行的華籍买办陈瑤章，在当时重庆的日本租界窵角沱附近開設日華合資的又新絲厂。这家絲厂形式上是日華合資，而实际上最大的股东却是日商新利洋行和宮板；華籍股东有陈瑤章、游士勃、楊樑成、黃炳成等人。絲厂的設備是日本的东西；生产部門的主要負責人也是日本人。机器設備有日本坐纜絲車四百多部，历任厂长的，有荒川、橋本、降旗、佐籐。工务处主任是伴太石，工务处之下設的打包室、机炉房、称絲、教习、选茧、发茧、煮茧各車間的負責人，也都是日人赤羽、上田、大山（女）、田中（女）等等分別担任；華籍人員只分任了管理处事务部門的工作。从絲厂成立时由荒川担任厂长起，所有生产技术操作和一切管理制度都是全套日

本化，而且厂里的四百多工人絕大多数是以低工資招雇我国青年女工和童工为它創造巨大的財富。这家絲厂出品的生絲商標是“金牡丹”、“紅牡丹”，次牌是“蝙蝠”。它以我省的大量原料，繅制成品，按照日本規格打包装箱，运至上海銷售，不仅得到向洋行預售期貨先付訂金的便利，而且較川省其他絲厂的产品每关担要多卖五十多两。从該厂設立以来，被它掠夺去的我国人民財產物資，为数不貲。又新絲厂后由华商李敬之（天順祥盐号旧执事）集資接收改組为大有絲厂。其后大有絲厂参加了大华生絲公司联合共营，随着大华公司的失敗而倒閉停业。

重庆絲业在这一时期，正式开工进行生产的鉄机絲厂共已达十一家之多。

### 重 庆 絲 帮 的 組 合

重庆早年，只有本城絲帮，在市场設置公秤，便利絲业交易，取有极少手續費，以作繳用。自有鉄机絲厂以来，成立了“改良絲帮”。其后时局多故，四川形成防区制，軍閥混战頻仍，重庆又是軍閥必爭之地，进进出出的軍閥筹餉派款层出不穷，工商业負担的苛捐杂稅十分繁重，商民不堪其扰。在这种情勢下，工商业者不得不成立自己的共同組織，来应付封建軍閥的压榨。我家經營絲业多年，与同业有深厚关系；同时，我也抱有兴办实业爭取外汇的意愿，遂于民国十三年（1924年）联络絲业各厂商，并以重庆各鉄机絲厂为骨干，成立了重庆絲业公会。会章制定：“本会由重庆絲商同人发起，集合各絲业而成，以維持絲业之进行，排除絲业之障碍，研究关于絲业之发展上的种种計划为宗旨”；同时指出：“本会既系維持絲业起见，自当不分畛

域，凡业絲而区域未在重庆，但必以重庆为轉輸者均得加入本会，共同扶助，并得享同等之权利”。因此，重庆絲业公会包括的范围就较为广泛，計有：重庆各鉄机絲厂、本城絲帮、川南帮、川北帮、合川帮、陝西帮（主要牌号是天增公）、云南帮以及后来加入的广东帮和上海帮，骨干則是重庆各鉄机絲厂和云南帮（云南帮在重庆設置庄号，代表各庄号經常参加重庆絲业公会为會員的，先后有赵子藩、段天池、李俊英、王惠、杨瀛亭等）。由于四川是西南的唯一产絲区域，重庆又是川絲的集散地，有些商戶虽到外埠运貨，但資金調动、营业策划的重心都在重庆，所以重庆絲业公会就成为了省内省外經營絲业的一个共同組合。

抗日战争爆发，生絲經營范围，日益縮小，特别是1939年四川省建設厅在重庆成立了“四川省土茧土絲管理委员会”，限制生絲自由买卖，使生絲經營更感困难。后来，反动政府眼见生絲业务每况愈下，一蹶不振，并且絲业界又反对土茧土絲管理会的种种严格限制，不得已才在1944年頒行了授权私商生絲出口办法，想借此为它多掙一些外汇，所以，那时原非絲业商家的中国国貨联营公司、广大行等以为有利可图，都来加入同业公会經營絲业。因此重庆絲业公会参加的會員盛极一时，重庆当地的會員，包括着17戶到27戶商家，大型戶有官商合办的四川絲业公司，中型戶有宝元渝、中原貿易行、华懋公司、四川物产公司，小型有三源利、义和永、益記、順記、业記、森記、林記、樵記等；云南帮有茂恒、永昌祥、泰記、南裕商行等；上海帮有和記、裕丰实业社、安孚公司、联兴公司、中国国貨联营公司、广大行、若記貿易行等。那段时期，由于上海帮、云南帮取得了反动政府的外銷生絲定担額授权出口生絲，并运外貨进口，两得其

利，算是比較走“紅运”的一些絲商。但是此項办法仅曇花一現，行之不久便宣布廢止，那些兼業絲商也就退出絲業公會。

重慶絲業公會創立時設總董、副董，我任總董，天福絲廠經理張筠書任副董。其後公會曾經多次改組，名稱迭有變更，如：1937年改為四川省重慶市絲業同業公會，1939年以後改為重慶市生絲輸出業同業公會，解放後，經過行業調整，販運、零銷部分併入土產輸出業同業公會，繅絲部分併入機器紡織業同業公會，至1958年，隨着同業公會的历史任務的完成而結束了同業組合。其間共有三十三年的历史。

## 二、重慶生絲業的演變

重慶絲業界與四川、雲南各地的絲業是互相關連的，在過去二三十年中，變化是很大的。以重慶絲業公會的成員來看，最多時曾有一百多戶，最少時只有二戶，這些演變，說明了重慶絲業的一段興衰縮影。

### 短暫的繁榮時期

從前面敘述看出，重慶絲業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才由發軔進入發展時期。當時由於帝國主義無暇東顧，暫時放鬆了對我國的經濟掠奪；加以1923年，占國際市場80%的日本生絲，因受國內大地震的影響，產量銳減，我國生絲在國際市場供不應求，川絲國外輸出量驟增，這就促進重慶絲業生產經營的迅速發展。那段時期，重慶除已設立的十一家鐵機絲廠外，絲幫分散於川東南北經營的，共達一百餘戶，並且多系經營外運為主，在川絲年產量三萬多担中，外運上海口岸轉銷歐美各國的約一萬五千担，

省內銷用的約有八千担至一万担， 云南帮运銷印度、緬甸的約五、六千担。当时川帮做生絲外运者，又大都兼营布匹、棉紗业务，一时甚为繁荣。

但是，重庆絲业在发展的道路上，正处于內受川省連年混战，封建軍閥的压榨摧残；外受帝国主义的掠夺摆布，以及国际市场的种种影响下掙扎生存。这样，重庆絲业遂由短暂时期的繁荣逐步衰退下去。

例如，重庆为絲厂集中之地，各絲厂須在每年四五月間絲苗月份购苗繅絲。在产苗期間，除向附近地点购苗外，还須紛紛派員前往川北三台、南充、射洪、盐亭等产苗地区大宗收购，并深入农村赶场（集），以现金与蚕农交易。由于川战頻仍、盜賊蓋起，攜帶现金易遭搶劫，故用运貨方法，提前販运棉紗疋头等貨到川北售出现金，以之购苗，此种办法比較安全，但也遭到一些意外打击。如民国初年，堂兄溫晞谷赴川北购苗，乘木船返渝，途經合川草盖子时，同行数人均被匪徒綁架，經多方营救始得脫險。尤其令人难忘者，1928年购苗期間，又曾遭到川北軍閥田頌堯部属孙德操的摧残。当时云南半元充斥川北，此項半元含銀甚少，无形中貶低了貨币价值，重庆运到川北的貨，均在当地出售，收入貨款全系半元，准备以之购苗。正当鮮苗上市的前几天（鮮苗上市有一定时期，出入不过几天），孙德操突然发布命令，川北轄区一律禁止使用半元。其时在川北流通的半元，几乎全部归入絲商之手，軍閥一紙命令，使重庆絲商所握现金全不能用，只有另行設法电匯款項，才能着手购苗，等于多准备一套苗本，多付利息，也打乱了购苗計劃，事后只有将保存的半元僱船押运回渝处理。各厂运回的半元为数甚巨，我以重庆絲业公会

負責人代表各厂与軍政当局及重庆銅元局接洽，将半元全部鑄化，按照规格鑄成通用的大元，半元含銀甚低的損失加上改鑄加工費，亏累不堪，重庆絲商受到的損失难以指数。同时，重庆絲厂由川北用木船运茧回渝，沿途关卡林立，苛捐杂稅不一而足，对于江防、峡防、护商等組織也須繳納派款，大大加重了生产成本，影响絲业的发展。

又如，重庆生絲运申后，存入絲棧，議价出售，又遭到洋行买办的操縱剝削，吃亏很大。同孚經理黃勉旃曾于1932年敘述：

“洋行对于絲业交易，总是压迫絲商，非极快市面不肯加价，茲举九月二十七日与洋行談判交易之情形如下，当时日絲价为九百五十元(非紐約价)，紐約电报七十八分‘伊文来思’（即匀度）黃絲每磅标准价一元六角五仙，華絲一担合磅量一百三十三三，合計应得金元二百一十九元九角五仙，是日美金兌華价汇丰挂牌乃三十元零七角五仙，合規元百两，应划申价七百一十三两零七，須除去出口運費每磅一角金洋計算，不过应减去四十三两三仙五，尙划申价六百六十九两七錢二，同时与怡和开利所談交易，只还价六百廿两，我愿以六百四十两售牡丹商标（仍七十八分至八十分）尙做不起，可見洋行买貨非有四五十两一担差額不做”。这所說的剝削，还是按照規矩攫取的，由于絲商对国际絲价从不过問，致使洋行买办得以任意压价，所受損失更大。黃氏又述及絲棧情形：“向例由絲棧代售生絲一担，佣金及洋行开支、公量、檢驗、改包布袋数种及搖条，照七折合价每担約費銀十二三两，且过磅后向例延期十天付款，絲号尙与洋行直接交易，只認公量費每担二元（生絲檢驗所收），其余皆无，过磅付款不延日期，以是比較，每担亏損不下二十元。”这所說的剝

削，也成了絲棧的例規。重慶絲商一直依靠絲棧售貨，如黃氏與洋行直接交易的還不多見。其實絲商所受上海絲棧的損失還不止此，如生絲每箱有公秤一百零五斤，但過磅時往往有短秤情事，從未引起注意，當然每次所差並不為多，絲棧系用陸續偷竊方法，長期積累仍成巨數，這都是由於假手於人，防不勝防所受的損失。

自從民國二十年（1931年）前後，重慶絲業隨着國際市場的變化而轉入一蹶不振的境地。那時，生絲經營者因受日本生絲低價抵制和帝國主義人造絲充斥市場，使川絲輸出大受損失，特別是1931年東北“九·一八”事變後，由於受到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的影響，川絲外銷斷絕，這時，省內省外不能脫手的存絲數達六千担之多。由於大家只知道追求利潤，盲目經營，沒有認識資本主義周期性經濟危機的規律，以致經營絲業者虧折甚巨，如謙吉祥絲廠，就曾握絲千余担不售，息累日深，後來絲價慘跌，虧損即達一百數十萬元。甚至許多絲廠無力撐持，相繼倒閉，川絲面臨嚴重危機，產銷極度下降，估計那時，全川生絲年產量僅有五千五百担，總值不過三百萬元。幾年的演變，川絲開始由盛而衰，重慶整個生絲行業，僅僅經營着少數的內銷業務。

### 整理川絲與聯合共營

絲業的衰退嚴重威脅着絲業界的生存，當時，重慶的同學、大有、天福、肇興、同泰、華康、謙吉祥等絲廠曾組成“久和公司”，以集中力量聯合經營，挽救危機，但僅維持一年多的時間就告失敗。絲業界處於那樣困難境地，一方面提出“救濟四川絲業之意見”；一方面向國民黨反動政府呼喚救濟（那時，絲業公會曾先後推選我和李奎安到南京請願，由重慶二五稅局退稅）。

絲业界既向反动政府提請救济、扶持，这与四川地方政权企图用政治力量控制全川絲业，以广开财源扩张实力的目的正相吻合。于是，它就以“救济川絲”为幌子，趁机联络絲业界、金融界組織“川絲整理委员会”，想利用这几方面的力量来“整理”川絲。这个委员会根据当时四川善后督办公署的命令頒布了組織大綱，于1933年1月12日正式成立。委员会下設农业、工业、商业三个組，分別負責改良植桑养蚕；改良机械指导生产；整頓运銷对外貿易。内部組成人員，表面上虽然有絲业界、金融界的代表（当时我曾担任商业組負責人之一），而实际是由代表地方政权的刘航琛主持其事，总揽大权。自此以后，重庆絲业以至四川整个絲业就落入四川地方政权控制掌握之中。

川絲整理委员会成立后，根据所拟訂的“川絲业联合共营实施方案”，将川省各地十一家鉄机絲厂于1933年3月集成为一个联营公司——“大华生絲公司”。参加这个公司的，有重庆的同學、善順、大江、麗华、大有五家絲厂和乐山的华新，三台的稗农，南充的德合、同德、六合，江津的几江等共計十一家絲厂。

地方政权、絲业界、金融界原来以为四川絲业組成了这样一个托辣斯組織的联营公司，就可統一經營、齐一品質，免除竞争原料、竞售成品，团结对外、以謀川絲的复兴，但是，世界資本主义經濟不景气的冲击，日本帝国主义的生絲在国际市场的傾銷，上海絲市场于是一泻千里，每担絲价惨跌至三百八十元左右。这些外在原因，使这个新成立起来的联营公司并未得到好处；加以公司内部矛盾重重，經營管理不善，产品質低价高，竞争不过帝国主义的产品，只經營一年多，就亏折一百二十万元而倒閉，参加这个联合共营的民族資本家也遭受了重大的損失。

## 地方政权进一步控制絲业

大华生絲公司倒閉以后，四川地方政权在大华公司旧有的基础上，自1935年重新开辟了統制四川絲业的道路。最初的步驟，是集資二十万元組織“四川生絲貿易公司”。那时，四川軍閥刘湘投靠了蔣介石，担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刘航琛、卢作孚分任財政、建設厅长，他們以“便于整頓、指揮、管理川省絲业”为措詞，提出了統制川絲、合組四川生絲公司的原則和計劃，先后由卢作孚、何北衡（当时任航务处长）来到重庆邀約絲业代表的我和李奎安談話，說明他們的意图。当时絲业界鉴于大华生絲公司的失敗，对于重組这样一个公司，一般厂商就无法自行經營，恢复过去的損失。因地方政权的計劃有“对自由生产之絲厂，予以严格取締”、“原有大华各絲厂得由建設厅及生絲公司派人考察，其合用之厂或合用之部分估价接收”、“无法处理之絲厂，由建設厅就地商筹利用厂房或其他可用之設備”、“不加入生絲公司者，得拒絕考察其旧股”等等。这些限制引起了絲业界的强烈反对，所以，当时曾由我和李奎安、孙述禹、奚致和、黄勉旃等代表重庆、南充、川北、川西各地絲商向建設厅长卢作孚提出意見两点：（1）成立生絲公司，应請政府备价接收各厂厂址、机器設備；（2）以前未加入大华生絲公司的肇兴、天福、謙吉祥、同泰四家絲厂，因負債甚多，无力加入四川生絲公司，其厂址、設備，亦請政府备价收买，否則准其自由营业。卢作孚当即以“各商請求，与我們之計劃大不相符，政府为了振兴实业，故非統制不可”为理由，拒絕了絲商的申請。同时肇兴、天福、謙吉祥、同泰四家絲厂也請絲业公会轉函卢作孚申明不愿加入四川生絲公

司，自行集資營業，同樣遭到盧作孚的拒絕。在地方政權這樣的嚴格控制下，它們終於被迫停廠關門。這裡可以看出，組織四川生絲貿易公司并不出於各家絲廠的情願，而是由地方政權利用政治勢力一手造成，借以達到壟斷全川絲業的目的。

在地方政權勢力控制下，四川生絲貿易公司于1936年3月18日，由何北衡主持，在重慶絲業公會召開了發起人會議。推定以何北衡、奚致和、張鑑泉、黃勉旃、胡天齡、楊贊卿、曹曉嵐、陳麗生、孫述禹、童斗泉、余式康、溫少鶴、李奎安、熊子昌、鄧鶴年、李會嘉、李敬之等十七人為發起人，奚致和、黃勉旃、溫少鶴、李奎安、童斗泉、何北衡等六人為公司章程起草人，隨即於四月份公司正式成立。

之後，四川地方政權進而採取了統制全川絲業的一系列計劃與措施，如：成立四川蠶絲管理局，接收川絲整理委員會；建立蠶桑改良場，育蠶種桑；重要產絲區域設立蠶市場，嚴格管制蠶蠶買賣；嚴禁其他木車廠及蠶販購買白蠶；規定改良蠶蠶，由四川生絲貿易公司統一收購，統一纜制；限制非加入生絲公司者不能改用鐵機纜絲，等等。這些限制實施以後，發生的糾紛事件層出不窮，特別是在收蠶期中，“官方”與一般廠商、蠶販為了爭購蠶蠶，曾在川北三台等產蠶地區，經常發生雙方斗毆事件，所以地方政權曾命令重慶絲業公會：（1）協助生絲公司收購改良蠶蠶，嚴禁廠商私購或自纜土絲；（2）協助辦理境內的鐵機絲廠的登記，必須省政府核准後，始准工廠纜絲。

地方政權的這些措施，很顯然地將使一般廠商難以生存，絲業界雖然一再申請四川省政府主席劉湘取消限制，准許廠商購蠶纜絲，借以增加川絲對外貿易數量，減少工人失業，保全絲廠設

备。但是，地方政权仍然坚持所谓这是“关系复兴川絲的整个计划，不能变更”，来达到它统制全川絲业的总体计划。

### 三、四川絲业公司的成立

#### 公司的組織概况

四川生絲貿易公司成立一年以后，地方政权又积极布署扩大川絲經營的计划，这就是1937年組成的“四川絲业公司”（改“生絲”为“絲业”意在兼营与絲业有关的业务，如制种场、冷藏庫、織綢厂、絹紡厂等，不以生絲为限）。

四川絲业公司筹备之初，代表四川地方政权的刘航琛于1937年5月初，在重庆邀集了絲商代表的我和李奎安、黄勉旃及四川生絲貿易公司董事长何北衡协商了以下原則：（1）以四川生絲公司各絲厂及投資人为公司之主体人；（2）以四川生絲公司原有資本，各絲厂估价之财产，及投資人之现金，为公司之資本总额；（3）出品数量以推銷力量为标准，至于原来大华生絲公司的十一厂需用若干，以生产力量为标准，开工区域，以购茧区域为标准；（4）分配問題，按四川生絲公司之資本及投資人之现金，与各絲厂使用厂之价格平均分配之。

根据以上原則，由当时四川省政府拨給款項，連同建設厅筹办的桑园地亩等，将四川生絲貿易公司合組为四川絲业公司，并把过去因負債抵押于地方政权的大华生絲公司的十一家厂拨交四川絲业公司經營使用。四川絲业公司組成以后，它就完全操縱垄断了整个四川的蚕絲事业。

在刘航琛的主持下，于1937年5月8日在重庆川康銀行召开了四川絲业公司的創立会，推定了公司組成人选：董事长：何北